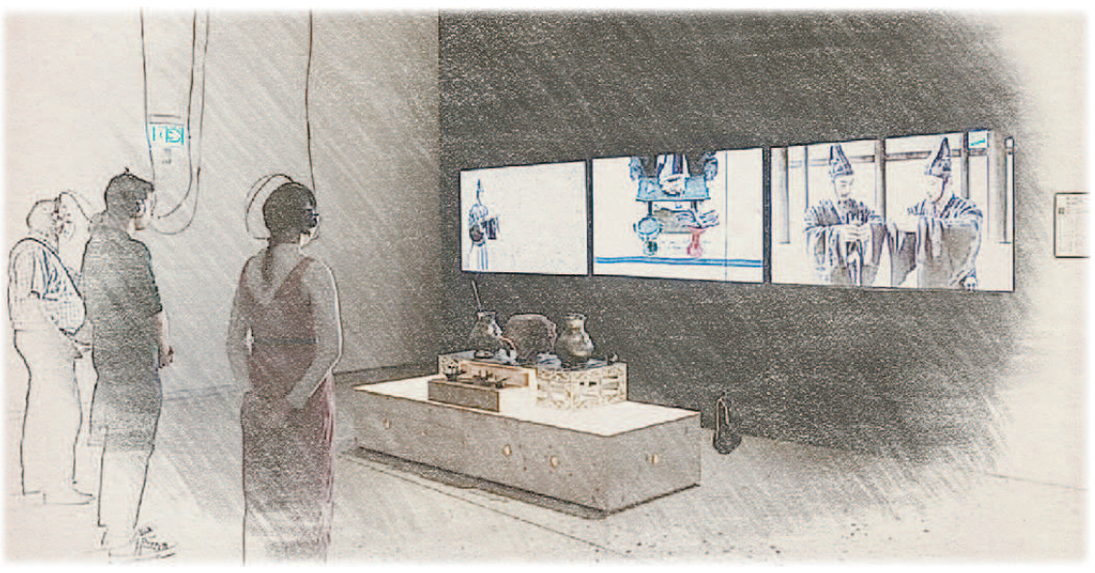
论衡

仪式消失后，如何重建

■ 李洛旻 张涛

技术进步加速了仪式的消失，但也为仪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而用当代技术手段来激活仪式，艺术形式至关重要。



在瑞士苏黎世举办的“深度仿造：技艺及其再现”展览（2021.9—2022.5）上，观众正在体验《仪礼》交互艺术装置。 照片经艺术处理

*Noema*杂志曾发表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对明星哲学家韩炳哲的采访，访谈是基于韩炳哲的著作《仪式的消失》展开的。在这本小册子里，这位韩裔德国哲学家延续了他在《倦怠社会》《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中的观察：现代社会使人类患上抑郁、过劳等疾病，而数字时代的来临无疑加剧了这种病症。在当代生活中，人们接受大量的碎片信息，这些信息既不提供意义，也不提供人生的方向。日益升级的数字通信方式重新定义了人际交往，而对人类的精神来说，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却更具腐蚀性。任意个体间联络沟通的技术成本降低了，看似增强了交流的便捷程度与可能，实则极易导致精神共识的瓦解——信息碎片不能凝聚成知识或真理，世界的信息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原子化，个体越来越自恋。如何才能抵抗这些“病痛”？韩炳哲找到的解药之一是仪式。

访谈刚上线不久，正与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邵志飞教授（Jeffrey Shaw）共同指导我们完成“《士昏礼》复原”网站建设的张颂仁先生，就把全文链接发了过来，点评说：“这篇文章涉及礼仪，非常及时。那本书英文翻译很优美，好读好懂，估计他写的德文也跟其他德国哲学家不同，用短句行文，所以很受大众欢迎。”我们对韩炳哲讨论的问题都很关心。

韩炳哲给现代社会的“解药”

在韩炳哲看来，仪式是古典时代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一种象征性实践技术，同时亦能够使人类个体获得生命的安顿。这些仪式散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戏剧、舞蹈、节日、时尚、体育比赛以及战争等活动无不具有仪式性。仪式保证了社会交往的客观性，可以抑制人类过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倾向。正是仪式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仪式感”稳定了人类的生活，造就了基本保持稳定并逐渐演进的社会。

然而，从现代社会开始，人类的仪式感就不断遭到剥夺，工作侵占休闲，生产取代生活，仪式的象征性愈发微弱。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情况变得更糟，人类甚至不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将产出知识的权力让给了信息和数据。数据主义（Dataism）结束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

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不可谓不严厉，可是，人类的仪式与仪式感在信息技术与数据革命的暴力摧残下既然已经支离破碎，又怎能指望这样的仪式充当消除当代社会精神病痛的解药？他在书中并没有给出答案。在回应内森·加德尔斯的提问时，韩炳哲同样没有说明仪式如何解决当代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个振兴仪式的方案——作为哲学家，他竟然没有乞灵于哲学，而是转向了艺术——韩炳哲认为艺术应当在当代仪式振兴中扮演核心角色。

转向艺术这一点倒是与《仪礼》复原项目的思路不谋而合。仪式固然是现实社会生活实践层面的产物，但是当一项仪式作为人类认知对象，尤其是在前现代的“礼仪”经过媒介装置的刻写之后，展示于受众面前，它就被纳入了美学的范畴。问题是，伴随精神自恋倾向而来的正是艺术活力的丧失。以这般身心，如何创造艺术，又如何发挥感染效果再来拯救精神世界？韩炳哲同样未能指明。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况且，他对信息文明抱有深切担忧，会否愿意借鉴当代技术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也值得怀疑。

《仪礼》是“活的遗产”

其实应该听听艺术家们的想法。从历史上看，在接受并应用新鲜技术这件事上，艺术家本就是先锋。

“艺术家对新的技术世界的人工造物感到某种亲和力。”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在《艺术的真相》（2016）一文中如是说。格洛伊斯指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与展示模式，互联网、社交媒体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艺术机构，成为艺术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平台，艺术品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艺术家的生存境况也已完全不同于过去，艺术的主题及其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也对计算机“算法”究竟会如何影响艺术发展不无隐忧，格洛伊斯还是看到了信息时代的诸多优势，尤其是对艺术家创作方式的提升和重塑艺术品欣赏语境的可能。就在文章发表的同一年，格洛伊斯策展的第八届斯洛文尼亚U3当代艺术三年展开幕，展览主题“超越地球”；《仪礼》复原项目制作的《士冠礼》复原三屏装置也以“孔夫子的身体”为名呈现在这一展览会上。

《仪礼》复原项目利用所拍摄的视频制成了几种不同的装置和软件，其中之一就是《士冠礼》三屏装置。《士冠礼》视频以真人拍摄与虚拟场景迭加，再以三块屏幕来展示完整流程在不同角度的视觉效果。观众将以沉浸式的方式，依序观看到复原的《士冠礼》，感受从礼仪记录到器物分析的多向性展览环境。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当前新媒体的发展更重视探索视觉感知的沉浸式体验的可能。透过这一重制和再现，可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重大意义的革新。具体就《仪礼》复原项目而言，在设计复原影片的展现效果时，特别应用了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动作捕捉及动作标注等技术，希望制作出沉浸式交互体验艺术装置，如“乡射礼”App，佩戴VR眼镜观看360°礼仪全景视频等。运用这种虚拟形式来展示难读难懂、令现代人倍感陌生的古老典籍《仪礼》，可以让观众们暂时脱离周遭现实，完全进入礼仪场域，并与之互动，有助于重塑观众与礼仪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界定，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世代相传且不断再创造的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人类的仪式当然属于这样一种文化遗产。为《仪礼》复原提供艺术指导的邵志飞提出：“《仪礼》所记录的典礼仪式，在《公约》的定义下属于‘活的遗产’（living heritage），其形式与剧场或其他表演相似，同时具有物质及非物质的元素，包括动作、表情、器物、服饰等，只不过，儒家的典礼仪式更富有想象力。”

中国文化经典《仪礼》记载的仪式富有深厚的人文社会意义，如《士冠礼》确立成年后在社会的角色，《士昏礼》则透过仪式确定夫妇及宗亲关系，《乡饮酒礼》则有达德达尊、尚贤敬老之义，实行之有助于建构个人的社会伦理身份。仪式进行的过程对个人身体的控制有极高要求，亦讲究人际交流互动，如入门升堂的三揖三让，堂上堂下的拜仪、对答，以及行礼时的次序、节奏。如此，以沉浸式体验重温传统生活，利用具象化的仪式呈现去引介一套概念框架，巨细无遗地彰显“仁”与“礼”的古典思想，争取最大程度贴近中国传统礼学注重践履的精神实质，当可令今天的观看者、研究者循此开发出全新命题。

旧传统与新技术带来的交互体验

用当代技术手段来激活仪式，艺术形式至关重要。传统礼仪讲究行礼者在同一时空中的互动。要表述这种互动，进而让观者仿佛能参与其中，感受执礼、履践的核心意义，才是复原《仪礼》的最终目的。不同的装置和主题，呈现无穷变化的体验，对艺术作品自身来说，也是一个被不断解读的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并不是韩炳哲希冀的“将要开发新的叙事”，但的确是尝试“将我们的社会从集体自恋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

《仪式的消失》有一个灰暗的结尾。书中韩炳哲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2013年的电影《女性瘾者》。他认为，处在“后”时代的我们，因为碎片信息过多而面临失去意义的困窘。有趣的是，“《士昏礼》复原”工作同样是从拉斯·冯·提尔的一部电影中获得灵感——2003年的《狗镇》。这部影片没有任何外景，所有场景都在摄影棚内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搭设，极度简约，甚至可以说是一张平面图。大部分布景是虚拟的，狗镇上的各家各户和街道，都是用白色线条在地上区隔出相应领域，用文字做提示说明，仅有少数几幢建筑有不完整的门窗、墙壁和果园，甚至那只经常狂吠的狗在整部影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是画在地上的。

受此启发，复原团队尽量减少实景搭设，仅设计一些最基本、有礼仪用途的古代房屋简易结构，如堂、台阶等；后期制作时，先用3D建模技术在视频画面里重构建筑模型，随后抽离模型，保留人物、器物和舞台框架，人物再开始行动。这对于门内门外进出走位实在繁多的《士昏礼》来说，应当是最合适的选项。观众得以藉此直观地“透视”人物在室内场景中的礼仪动作，“进入”礼仪空间，并深度融入艺术作品，切身感受旧传统与新技术共同带来的交互体验。

诚然，技术进步加速了仪式的消失，但也为仪式的重建提供了可能。

（作者单位分别为香港都会大学、清华大学）

文匯学人 第542期

资讯

重印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走向世界』的学术版

■本报记者 李纯一

图书馆学家袁同礼（1895—1965）曾编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学欧美大学者的博士论文目录，得4717篇，其中不乏中国学人海外著述的顶尖作品。如今，中西书局将择优刊印，以《中国学人海外博士论文丛刊》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学界的一个侧影。

5月6日，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丛刊发布会暨“中国学人海外获得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坊上，中心主任、丛刊主编陈引驰教授说：“他们或努力于西学之升堂入室，如陈康的《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及《巴门尼德斯篇译注》；或以现代方式重理固有学问，如胡适《先秦名学史》及其后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或比照以观而构建新论域，如冯友兰《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天人损益论》）等等——这些名家名作，构成了中国文化在现代承传、转型、提升的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脉络。”

陈引驰同时回忆了自己与其中两部书的前缘：林藜光《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校订研究》和方志彤《庞德〈诗章〉研究》。林藜光（1902—1945）是现代中国佛学研究的杰出学人，可惜英年早逝。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是朝鲜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常年任教哈佛，是一位颇具传奇性的“百科全书式学人”。然而，这代学人的功绩现已堙没不彰，辞书出版社社长、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谈到，如林藜光先生，是近年经由学者在媒体上介绍才为人所知：“我们希望在学术史上做出过贡献、留下过成果的这些学者都能被记住，这也是我们这套丛刊的立意。”丛刊将以影印原文形式出版，如有当时译本一并附入，还会加上今人所作的解题导读，展现前辈学者对选题立意的挖掘、对方法取径的组合或借鉴。另外，据丛刊发起人黄曙辉介绍，书局“寰宇文献”系列立志以莱布尼茨“世界图书馆”的理念刊印西学文献集成，他正是在此过程中接触到了林藜光和方志彤。1980年代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1840至1911年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赴海外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留下的文字，是早期中国人走向世界、观察现代文明的记录。黄曙辉希望，“我们的丛刊，会成为《走向世界》丛书的‘学术升级版’”。

丛刊已出胡适《先秦名学史》、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张馨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林藜光《梵文写本〈诸法集要经〉校订研究》、方志彤《庞德〈诗章〉研究》等。《文汇学人》刊录会上部分发言，期待引起更多讨论。

海外博士论文的文献来源分散，查找起来相当不容易。这项工作恐怕也只有在国际互联网数据库建设比较完善的数字人文时代，才有可能完成。

——席云舒（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侯仁之先生和我们的谭其骧先生虽然都做历史地理，但他们是两种研究方法。侯先生偏重自然地理、城市地理，谭先生则是做疆域历史，偏考据。

侯先生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是《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在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则有很大改观，使用了自然地理的学科方法，尤其是提出了“北京湾”的概念。

这也是中国学术一条有益的发展路线，侯先生是把自己的学问拿到世界上去检验、去清理，锤炼成熟，并且系统化。这是非常有效的。他留学的一个动因就是燕大有一种建立学科规范的自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要建一个学科说难也不难，就要有这么几代人认认真真地做，把这个学科的规范、方法找到，找对了，它就成了。

我议论了别人的学科，和我本科时候的兴趣有关。后来我做上海史，做上海城市的研究，总是在想，我们需不需要一种学科的规范。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我们看他们的博士论文，会发现几个共同点。一是都关注中国问题，尤其是当时热点问题，无论是古代学术的热点，还是社会生活的热点。如胡适把儒学放到诸子里面来讲，如顾维钧讨论在华外国人地位，如侯先生研究北平城市地理。二是他们都受到海外学术的训练，用现代的方法和观念来处理学术问题。如胡适讨论名学，就涉及方法论，侯先生用地理学的系统观念来考察北京。三是由他们的早期著作看后来的志业轨迹，很多人都是学以致用，兼有学行的，大部分人的职业发展还是和博士论文有很大关系。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觉得我们还要注意到，拿到海外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中很多是科学家。我到格拉斯哥大学档案馆时，管理员非常兴奋，说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能不能找到人帮我来整理这些材料。格拉斯哥是理工方面的重镇，丁文江就是这里毕业的。

可能文史哲的老师对这些不一定有兴趣，但这些博士论文反映了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研究，包括他们在国外学了什么东西，带回来什么东西。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里也有很多科学家，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就是康奈尔的博士生们创办的。

——高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物馆与美好生活

■ 张昱

早在公元前307年，斯里兰卡天爱帝须国王统治期间就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开始关注人类社会进步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18世纪末工业革命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生活条件恶劣、贫富悬殊、传染病蔓延等各种城市问题也随之而来。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理论都致力于剖析城市过度发展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与自然和人性的冲突。人文理性的回归迫在眉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亟待重置。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提出，系“在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情况下满足当前需求的发展”。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文化纳入社会和经济包容、环境可持续性政策之中。人类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来设想和塑造一个更包容、公正和公平的世界。博物馆作为重要载体，当积极参与其中。这或许也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再一次聚焦可持续和美好生活的原因。

博物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定义了社会价值观，从而确立了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习俗，形成了社会文化特征。通过产生文化，人们改变和适应周围的环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留下有关生命、自然和科学的丰富文化遗产，并赋予其多层次的价值。

现代博物馆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民主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18世纪后期，博物馆开始走进公众生活——美第奇家族将四百多年来积累的全部艺术遗产捐赠给政府，1795年，乌菲齐宫作为艺术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

近几十年，博物馆进一步确立了“社会服务”的职能。作为值得信赖的知识来源，博物馆越来越被认为能够广泛保护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和社会参与渠道。博物馆对自身藏品展开学术研究，支持可持续的文化遗产旅游，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发声，在外部合作网络建立的过程中直接发挥领导力或通过协作强化伙伴关系，确保相关资源在当下和后代都可及可用，形成了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等可持续发展特征。

博物馆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保护措施，使藏品更久远地传诸后世。有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馆极大助益了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记录，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和接触遗产的机会。如敦煌研究院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了“数字敦煌”的实践探索。而教育和研究领域的变化也促使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保守的精英主义倾向中解放出来，转向为社会和大众传播知识。

博物馆是城市和社区中的一种“舒适物”设施——特里·克拉克认为，博物馆与其他舒适物以组合的形式，共同赋予了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

博物馆能够助力形成一个知情的、可参与的文明社会，提高公众的“自我治理”能力，促进社会整体关系向着良好方向发展，为公众创设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福祉。拉美地区博物馆界的《圣地亚哥宣言》（1972）即探讨了博物馆如何介入社会环境、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将博物馆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态工具”。面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移民、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等当代社会诸多问题，博物馆都有所表达。如采用旧城改造遗留下来的旧砖瓦、陶片建造而成的宁波历史博物馆，展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如故宫博物院的“零废弃项目”，带动工作人员、观众和导游等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故宫的绿色发展；再如广西博物馆组织的“桂绣”培训，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与推广性传承，为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物质文明条件下的可持续传承提供了可能。

在服务现代社会多元人口方面还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英国博物馆协会发布的《作为福祉空间的博物馆》报告。协会为其会员博物馆罗列了一份关于健康和福祉的清单，涉及精神健康、老年人与边缘人士福祉、学习能力障碍与康复等，推动各类博物馆为这些人群提供更广泛的福利。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先具备可持续的文化思维，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教育是让人们意识到保护和平衡利用资源的绝佳方式，如何寓教于博物馆这一现代社会的独特组织，促成美好生活，将是探索的持续重点。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